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4-15

齐鲁晚报

2022年12月22日
星期四

□ 美编：陈明丽
□ 编辑：李皓冰

清代山东的县衙和县令

在清代山东有多少县衙呢？清代山东共设十府96县，全省就有96座县衙，县令们就是在县衙里施行行政的。



清代即墨县衙

□ 刘永加

清代县级行政区划

“山东”这一名称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。那时，关中的秦人称崤山或华山以东地区为山东，他们也会把秦以外六国领土称为山东。到了唐朝，太行山以东的黄河流域广大地区被称作山东，唐代末年就有人以山东专指齐鲁之地了。金代设置了山东东、西二路，这时山东才真正成为政区名称。元顺帝至正十七年（1357年）正式设置了山东省。明代仍设置山东行中书省，驻地益都，后又改称山东承宣布政司。

县级行政机构出现在秦统一六国后，当时秦始皇在全国推行了郡县制，县作为行政区划开始在山东出现。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，到了清代，山东县级区划政权已经发展得很完善了。

据《清史稿·地理志》记载，清代山东全省辖有济南、东昌、泰安、武定、兖州、沂州、曹州、登州、莱州、青州10个府和临清、济宁、胶州3个直隶州，下设8个散州和96个县。具体如下：

济南府下辖，德州和历城、章邱、邹平、淄川、长山、新城、齐河、齐东、济阳、禹城、临邑、长清、陵县、德平、平原等县；东昌府下辖，临清州、高唐州和聊城、堂邑、博平、茌平、莘县、清平、冠县、馆陶、邱县、恩县、夏津、武城等县；泰安府下辖，东平州和泰安、肥城、新泰、莱芜、东阿、平阴等县；武定府下辖，滨州和惠民、青城、阳信、海丰、乐陵、商河、利津、沾化、蒲台等县；兖州府下辖，济宁州和滋阳、曲阜、宁阳、邹县、泗水、滕县、峄县、金乡、鱼台、嘉祥、汶上、阳谷、寿张等县；沂州府下辖，莒州和兰山、郯城、费县、蒙阴、沂水、日照等县；曹州府下辖，濮州和菏泽、单县、城武、钜野、郟城、曹县、定陶、范县、观城、朝城等县；登州府下辖，宁海州和蓬莱、黄县、福山、栖霞、招远、莱阳、文登、海阳、荣成等县；莱州府下辖，平度州、胶州和掖县、潍县、昌邑、高密、即墨等县；青州府下辖，益都、临淄、博兴、高苑、乐安、寿光、昌乐、临朐、安邱、诸城、博山等县。

县级是古代政治体系中的基层政权组织形式，对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。其长官为知县，“凡一州县之政令、赋役、诉讼、文教、农事诸项，皆亲自办理，故有‘亲民之官’之称。”知县行政办案的地方就称为县衙，清代山东有96个县，自然就有96个“县衙大院”。

山东遗存知名县衙

县衙起始于秦代设立郡县制，称“县治”，到明代称“公署”，清代也称“衙署”。对县级行政机构设置县衙，古人有明确的定义。明代的武英在《重建（余杭县）琴堂记》中说：“国家开设县治，必首建厅堂，为听政之所。”这里所说的“厅堂”，指的是县衙中的“大堂”。大堂为“听政之所”或“行政临民之所”，是因为县令办案及执行政务大都在此进行，所以古时会以大堂来代称县衙。但是，县衙除大堂之外，还有后堂、花厅、签押房、幕厅、六房、三班、监狱以及大门、仪门、宅门等，这一系列建置，才构成了通常所说的县衙。

其中大堂是正厅，面阔三开间或五开间，是衙署内最为高大的建筑。这是县令升堂理事的所在，所以又称为“治堂”。大堂之左置有大鼓，县官升坐大堂则鸣鼓。大堂后边就是“宅门”，将衙署分为“外衙”和“内衙”两大区域。内衙不仅包括知县办公的“二堂”，还有知县的住宅“三堂”。在清代，县衙门的建置格局较前朝虽有所变化，但基本一致，且全国各县衙门在格局与体制上大体都相同，山东也不例外。

如今山东遗存的清代县衙建筑已经屈指可数，其中比较知名的有临淄县衙大门和大堂，滕县县衙现在也只剩个大堂了，曲阜县衙仅存二堂。全省唯一能够看到大堂、二堂和三堂的老县衙当数即墨县衙。即墨古县衙，位于青岛市即墨区中山街东端路北立法街29号。据记载，隋开皇十六年（596年）即墨迁城立衙，元代至正年间进行过重建，明清两代先后进行了十余次修葺和扩建，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县衙建筑群。



郑板桥画像
清代乾隆七年郑板桥曾任潍县知县

即墨县衙一堂，即正堂，或称“大堂”和“公堂”，是诉讼、审讯的场所。正堂为三进三进式建筑，东西两侧开耳房门，屏风后开门通二堂。后来经过维修，堂内恢复了旧时装配，二进上方悬挂“明镜高悬”与“忠爱”横匾，其两侧略低，悬挂“清正廉洁”与“执法如山”横匾；“正大光明”匾下安置案桌，执事、堂鼓等列排案桌前两侧壁下。正堂后面是二堂，配两厢。二堂还叫“印堂”“鸣琴”或“致远”，是议事办公和会客的处所。二堂后为三堂，也配了两厢，是县令与眷属的内宅寝室。现在即墨县衙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。

县衙里的人与事

清代县级衙门首要官员一般有知县、县丞、典史三职。知县总揽一县之政，秩七品；县丞分理粮务、水利、交通等，秩正八品；典史专职缉捕盗贼和监狱事项，秩从八品。此外县里还设有教谕、训导各一名，负责教学和文庙祭祀，秩正八品。

县衙内的设置有六房三班，六房分吏房、户房、礼房、兵房、刑房、工房，与朝廷六部对口。六房的职责是任免官吏、升降、考课、调动等事项。其中户房职责是掌管土地、户口、漕运、救荒、田赋、派捐等财政收支事项；礼房职责是掌管学校、贡举和风化教育、宗教以及接待宾客事项；兵房职责是掌管兵器、驿站、邮传、关禁等事项；刑房职责是掌管法律、刑狱；工房职责是掌管屯出、水利、交通、营缮、工匠等事项。三班为皂班、快班、捕班，其职责是，皂班，掌管守牢狱；快班又称壮班，掌传递召唤；捕班，掌侦查破案缉拿，各班人数不一，少则十余人，多则近百人。

县衙里具体办事的小吏被称为胥吏，虽不是正式官员，却负责维持衙门的运转。他们熟悉当地语言，对民俗民风、人情世故都很了解。同时，他们对各种规章制度、案例条文和政务内容都很清楚，因此胥吏凭借对律例的精通，操纵司法、借诉生财的现象十分普遍。贪图钱财、徇私枉法、诬良为盗，是当时胥吏表现突出的一个腐败现象。

对此，乾隆年间曾任莱州知府的清代名臣张船山就敢于管理与整治，惩治了一批利用办案侵害百姓利益、徇私枉法的害群之马。其中，莱州府下属的昌邑县有一个叫唐如松的胥吏，贪污受贿成性，他胆大妄为收受贿赂徇私枉法案发，张船山判唐如

松八十大板，发配到两千里外。掖县有个书吏叫程耀堂，是个著名的酷吏，案发后张船山判道：“审得掖县工房书吏程耀堂，倚仗官势，狐假虎威，横行闾里，无恶不作。该县令史炳文昏庸糊涂、贪墨酷虐，一闻报告即逮捕许靖康（当地一平民）到案，不问根由、不询原委，一言不合，即用大刑。史县令之荒谬狂妄实堪痛恨。如此草菅人命，万非一革所可了得。应详请奏革后，再发交后任按律审断。胥吏程耀堂，索诈不遂，诬良作盗，应即斩决，以快人心。许靖康情有可悯，应即开释。此判。”

张船山对于县衙里腐败的胥吏、书吏等人的惩处，有效净化了县衙里的风气。

清代山东著名县令

清代山东96座县衙里出了不少著名的县令，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江苏兴化人郑板桥了。

清代乾隆七年（1742年）郑板桥上任潍县知县后，对一些积弊一律整改，并宣布：“不准贪赃枉法，鱼肉百姓，违者严加查处，决不留情。”对于前任留下的大量积案，郑板桥一律秉公执法，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，就将积案一一判明，严惩了一些平日横行乡里的恶霸，当地百姓一致称颂郑板桥刚正廉明，明察秋毫，正如他写的那样：“衙斋卧听萧萧竹，疑是民间疾苦声。些小吾曹州县吏，一枝一叶总关情。”

清乾隆四十年（1775年），陕西武功人张玉树由山东清平知县调任峰县知县。到任后，张玉树仔细观察身边吏员的所作所为，凡有不端之举者一概罢免，当地政风为之一变，地方志也记载“胥吏敛手不敢为非”。他主政峰县十年，创建学校、兴修水利、设置义仓等，深受百姓爱戴。尤其是他将峰县的城墙、城楼加固修葺一新。时任兵部侍郎的陕西韩城人，状元王杰专门为他撰写了《峰县修城记》，镌刻于碑立于城内。由于张玉树治理有方，峰县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的局面。

在清代山东县令中，还有一位最为特殊的县令，他在任仅仅七个月，却留下了突出的政绩，这就是乾隆年间，河南偃师人、博山县知县武亿。

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年），武亿被授山东博山县知县。博山县山多土瘠，产煤、石矾等矿藏，民多不务农，而以采矿为业。百姓用石炭、石矾烧做玻璃器皿，而官员多索取，前任知县均以此馈赠上官，“浸以成俗”，百姓“供亿繁多”。再者，博山县原先不设驿站，于是出现了“按户纳钱，买马以充邮递，为秣之费，民则供之”的情况。当地本来资源丰富，却因为繁多的苛派，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，地方官为了中饱私囊，视而不见。武亿深知民之疾苦，上任不久便“手书其患，苦请除之”，终于将这些苛派“皆裁去”。

武亿敢于为民做主，不屈服于权贵。博山县有绿营兵驻扎，营弁多有不法。士卒张保曾为营弁抢民女为妾，武亿闻讯后，立即派人将张保曾缉拿归案。营弁请上官出来说情，武亿坚决将张保曾绳之以法，“自是佛上官”。武亿奉公守法，刚正廉明，但是因为屡次得罪上官，任官仅七个月，便被劾罢。“县闻武君去官，携老弱入省几千人，乞‘留我好官’”，却无济于事。

曾任山东布政使的孙星衍，是武亿的好友，他对武亿的遭遇曾有感慨：“武君真循吏也，在官七月而得民心。如是，令久于其任，治行当不止此。为县令者人如亿，吏治之弊不至不可移易。暴吏负愆愈多，去之愈有所牵掣。强项吏一出而被劾，且以沽名相诟嫉。不遇非常察举之诏，何以厉廉洁耶？”